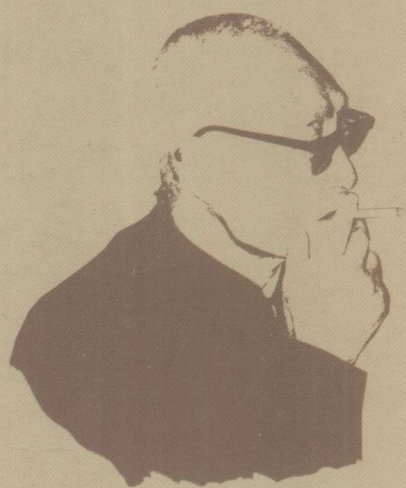




复归的素人

文字中的人生



复归的素人

文字中的人生

徐干生 / 著 徐贲 / 编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 / 徐干生著;徐贲编.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225-860-0

I.复... II.①徐...②徐... III.徐干生—回忆录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214 号

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

徐干生 / 著 徐贲 / 编

责任编辑:吕 林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1300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5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一版 201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860-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者前言

编这个文集,不仅因为作者是我的父亲,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从 40 年代过来的文化人。这一代人的学问、素养、道德、做人和经历遭遇都在越来越离我们远去,也越来越只能依靠他们留下的文字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文字传达的文化和社会记忆,不只是关于他们个人的,而且也是关于他们时代的。

总体而言,那个时代的文化人所运用的文字与现在大部分文化人或知识人的有明显的差别。他们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旧学根基,也受到外国语言文字相当的陶冶,正在形成一种融合中西古今的新的书面语言。这是一种较少被虚假和谎言污染的语言。而且,它还能够贴近口头语的时候,保持与口头语的距离。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区别,以及“会写作”和“会说话”之间的不同,使得“文字”成为一种特别能够帮助写作者塑造自己文化心智、价值理想、知识人格、人品个性的语言能力。

阅读这位作者的文字,你会不由得对他心生好奇:他究竟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可以把他留下来的文字当做认识和想象的素材,来再现一个从 40 年代走过 90 年代的过去人

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的文字看成是他生活情境中的个人纪录,并推而广之地去了解他的生活世界和在那里发生过的种种变化。前者是从文字得知一个人,而后者则是从一个人得知他的时代。

这个文集讲述的是一个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的文化人的故事。“文字”是记录和传达人类心灵活动的书写符号,是写下来的文和字。在一般的时候,他的文字是自愿写作的诗歌、散文和翻译。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他的文字是被迫写下的检讨、交代和劳改日记。

文字产生于个人,但又决非只属于个人。文字的不同也是时代的不同。无论运用于何种书写,文字都比说话更能够长久保存。写作的文字比口头说话更深思熟虑,更能够传承给后世来人。认罪的文字比口头说话更不容抵赖,更易于长期记录在案。从来不认识这个作者的读者要知道他是谁,惟有通过他留下的文字。文集作者留下的文字使得我们能够对他有所记忆,并通过他,保留一些对他那个时代的记忆。

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年轻时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这些不是挑选出来的代表作,而只是一些仅存的遗文残稿,是由他的一位亡友,他大学时代的挚友,冒着相当的风险,替他保存到“文革”以后的。作者自己曾经保存的以往作品和文稿都已经在“文革”抄家中丢失得无影无踪,不可复得了。第二部分是作者在“文革”期间,在“牛棚”和“劳改队”里写的检讨、检查和劳改日记。第三部分是作者在“文革”以后写下的一些诗歌、散文、翻译和回忆。这三个部分包括了作者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字:写作文字和认罪文字。文集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两种文字,因为它们在各自的意义上都是真实的,虽然迥然不同,但放在一起却比任何一种单独的文字都能更清晰、更完整地向我们展现作者这个人和他生活过的那个世界。

徐贲

编者序言

从 40 年代走来：文字与记忆

我父亲徐干生(1920-1998)是一个小人物,用他晚年在自述《复归的素人》中的话来说,是一个素人。章炳麟在《社会通论商兑》中说:“古者,宗法行于大夫、元士,不行于齐民;今者,宗法行于邨落素人,不行于都人士。”鲁迅在《书信集·致李桦》中说:“却究竟无根本智识,不过一个‘素人’,在信中发表个人意见不要紧。”朱自清也在《说梦》中说:“我是彻头彻尾赞美梦的,因为我是素人,而且将永远是素人。”素人这个说法应该有不同的意思。素人可以是朴素无华、没有文化、未经度化之人。素人也可以是与政治保持极大距离,不属于任何社团、组织、派别,对这些都抱有怀疑、戒备,凭普通人的常识判断事物的人。素人还可以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平民和平常人,一个地位寒碜、低微、无名无职之人。我父亲应该是这后两个意思合在一起的素人:一个自由自在的平常人。

我父亲是一个从 40 年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几乎同文字打了一辈子的交道。有人曾说:“如今在中国的思想史上,30 年代和 40 年代前期出生的人是被排除出去的。这是由于整个 50 年代,更由于‘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摧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我父亲是

在早于这两个年代的1920年出生的,1940年代已经在发表文学作品,但他仍然属于那些“被排除出去的”人之列,因为他和后面那两个年代出生的人一起经历了随后的时代。

在我父亲生活的时代里,当一个素人只能是他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现实。那时候,可不是想当素人就可以当一个素人的。首先,谁不管政治,政治就一定会管他,谁也不可能当一个游离在政治以外的人;其次,再平常的人总要吃饭,要吃饭就得有一个工作,属于一个单位,于是就有组织管着你,你也就自由自在不起来。为了养家糊口,我父亲当了一辈子的中学教师。只是在后来,当他终于可以告别他的教师生活,放弃了他的“三家村塾师”职务时,他才有机会成为一个素人,从此获得了他一生都在向往、但却难以企及的心灵自由,至少他自己是这么以为的。

1. 告别写作

我父亲写过两个自述,一个是“文革”交代材料《我的经历》,另一个是他成为素人之后的自述《复归的素人》。他在后一个自述中说,他一生中,只为自己做过两次决定。第一次是决定放弃写作,第二次是决定放弃教书。他畏于文祸,决定放弃写作的时候,不过刚刚三十出头。他后来回想道:“我在三十多年以前决定放弃写作生涯虽然是不很愉快的,但却不失为一种理智的抉择。”如果继续写作,“我将追随在众多的同人之后,亦步亦趋,为应诏或自荐而搜尽枯肠,同时卷入文化界的种种纷争……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就算竭尽所能,居然通过了各种窄门,那代价也将极其惨重。我将浪费几十年的光阴,战战兢兢地揣摩风向,先意承旨,唯恐逾越雷池一步。结果是不断灾黎祸枣,制造出一堆干时媚俗,败坏读者胃口的文字垃圾”。

在他告别写作三十年后,他又决定告别讲台,除了心脏病的缘故,还因为“文革”中的“恶性大暴露浇灭了我对教学工作的兴趣……

我已心力交瘁,再不愿尸位素餐,继续贻误青年了。”第二次放弃让他回到了第一次放弃前的原点。告别了讲台,告别了那个像一根绳子一样捆了他大半辈子的工作单位,他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所热爱的文字,为他自己,当然包括他的子女,而不是为任何别的什么人,悠闲、从容地进行写作。文字再次成为他的体验生命和思考自我的一种方式,成为他向素人复归的一条通道。我是经由他留下的文字而进入他那久闭的心灵的,没有这些文字,我所记忆中的父亲一定会是完全不同的样子。

在我父亲终于成为一个素人之前,他是一个在单位里被看成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一个总是生活在文祸恐惧之中,并不断被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折腾得永无安宁的人。他渴望回归去做一个素人,就是想摆脱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父亲从来没有向我完整、连贯地叙述过他一生的故事,也许起先是因为我还少不更事,而后来则是因为我已经远走异乡。我是在他去世后,才从他的“文革”交代材料中读到他一生的连贯故事。在这样的叙述中,那是一个污点故事,一个有历史问题的罪人的故事。

我父亲在“文革”的《我的经历》交代中说,他6岁入塾开蒙,14岁才进新式学堂,17岁初中毕业。“此时尚无政治见解,但已喜欢新旧文学。”为避日寇,他18岁时去到大后方的四川,先入南开中学,后入武汉大学外文系。他18岁就开始在章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和其他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因为曾卓(后为“胡风分子”)1941年给他的一封信,1955年被牵连到胡风集团的审查之中。

我父亲差不多一辈子都是在学堂里度过的,不是当学生,就是当教师。但1947年,为了生计,他出了学堂,在民国政府内务部的禁烟委员会当了一名公务员,为此填过一张发下的国民党入党申请表,尽管他后来并没有加入过这个党。他的工作是处理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上设麻醉品司(Narcotic Drugs Division)定期寄来的各国禁烟、缉



去重庆经过杭州,摄于杭州岳庙,左四是王佩珣(1942年)

私、禁毒文件。而正是这一年多的经历和那张申请表,让他背上了一辈子的十字架。介绍我父亲到内务部任职的是他的一位亲戚,名叫屠晋,是一位文职将军。据我父、母亲说,屠晋是个“人品、学问都好”的人。

我母亲在她发表在《老照片》上的一则回忆录里曾简略地提到过屠晋。由于她的未婚夫徐干生已经在四川,1942年,她刚过21岁,决定放弃在上海的学业,到大后方去求学。3月,她离开上海,和一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一起到重庆去,一路途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历时五个多月,于同年8月到达重庆。她成为当时的中央助产学校的学生。她刚到重庆,第一个去投奔的就是当时在内政部任职的屠晋。

我后来在《炎黄春秋》杂志上读到一篇谈戴季陶和民国初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高等考试的文章,里面也提到了屠晋。文章说,1931年第一届高等考试时,有几千人应考,三试发榜,仅录取了100人,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曾一一传见被录取者,以摆龙门阵的方式,作上下古今谈。当戴季陶看到有一位叫屠晋,号剑痕的同学名字时,惻然动容,自言自

语并意味深长地重复其词说：“屠晋，号剑痕……”他把“屠”和“剑”字的音调读得特别重，对屠晋说：“老弟，你这个名字杀气太重，甚为不祥！”屠晋答：“那就请院长给我另行赐名吧！”戴季陶说：“正是，我就想这么办，但你的名已不可改了……我想改你的号为‘希平’，就是希望和平的意思，这样可以起到相克相生的作用。”“希平”这个号没有能够改变屠晋的命运，他名字中的杀气确实太重、太缺乏祥兆，他没有跟国民党去台湾，但却在“肃反”运动中因为历史问题而自杀了。

2. 旧文残稿

在“文革”期间，我知道父亲不断为他在1949年以前的“反动文字”作检查交代，然而，在1977年以前，我并没有机会直接读到那些“文字”。“文字”是指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也就是写下来的文和字，尤其是文章（诗歌、散文、论文等等）。政治运动来临时，要检查、交代的话叫“黑话”，文章叫“反动文字”。



王璠(佩珩)(右)和同学(1943年)

“文字”在我父亲的一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要么是写作，要么是写检讨、检查和交代，都离不开文字。一般的时候，文字是一种比口头说话更适合于深思熟虑，更能够保存给后世来人的语言。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写作的文字就可能被用作罪证，而检讨、检查交代的文字记录则会被保存在罪人的档案袋里。文字就成了祸，成了罪的记录。对于一个从来不认识我父亲的人来说，了解他惟有

通过他留下的文字,包括他的作品和认罪记录。他在一生不同时期里留下的不同文字则比任何人的回忆都能更清晰地讲述他的经历和他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父亲 1949 年以前的文字已经大多不复可寻,他自己保存的约十万字旧作和几十万字手稿都在“文革”期间的两次抄家中全部丢失。有时候,家里来了文化界的客人,似乎听他们谈起过我父亲以前写过的一些诗,其中有一首有一个好记的题目《火烧的山》,好像还给 1949 年以前武汉大学的一个刊物用作刊名。1977 年 2 月,“文革”刚刚过去,我家收到了一个小包裹,是我父亲的武大老同学李军寄来的,同时还有他的一封信,信里说:“去冬,由于天气太冷,教学任务过重,胃病连续第三年复发,而且来势很猛,服一般胃药、止痛药均无效。后来,在医生的指导下实行一种‘八日疗法’,主要服痢特灵,现已进入第二个疗程。这种新的治疗方法相当有效,因此病情日渐好转。考虑到我们相见的机会越来越稀这一现实的可能性,我想趁着还没有‘稀’到等于零之前,让这批我保存了三十几年的文稿带着我对你的最良好的祝愿回到你的身边。”

小包裹里是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发表在报纸、刊物上的一些文章,还有一些手稿。这些制作极粗糙、印刷极简陋的纸片,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抗战时的物资是何等匮乏,有的已经脆弱得像是从坟墓里发掘出来的薄锦,拿在手上就像是马上会碎掉。它们也确实是从历史坟墓中被重新发现出来的证物,向这个世界传递早已被尘封、被遗忘的讯息。在那些发黄的纸片中,我第一次读到了那首我一直好奇的诗《火烧的山》,诗是用我母亲王佩珩的闺名“王璠”发表的:

我看见有执火的人在山半腰
我听见有好听的仙乐响在山巅
仙人的高楼差不多耸进云霄

高呵, 嗯, 太高了, 我不能看见

但我看见了有执火的人在山半腰……因为时间近了
你不小心的仙人, 你吞食四方香烟的好仙人
你自己居住着的山竟不注意
你主宰着宇宙但忽略你的山
你忽略了这是冬天你应当知道
草木黄落了最容易引火, 引火灾

我看见了执火的人全蹲下
我看见映在火光下的眼睛发凶光
我看见他们露出獠牙向山顶笑
我听见好听的仙乐依旧悠扬的响

……

乐声止了, 仙人呵, 我想象你脸色苍白
你那样精致的牙齿禁不住颤抖
你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你顿脚捶胸但没有翅膀
一匹苍蝇也比你强!

我又看见大地震动
日头变黑像丧巾
满月变红像血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

……

这诗像是在预言一个可怕的末日。那个山顶上主宰一切的“仙人”是谁？那个在山半腰弯腰蹲着、眼露凶光的“执火人”又是谁？他又为什么要烧山？我父亲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他只是用文字在婉转地表示，“仙人”和“神”是他极其不肯相信的神秘至尊。在他1981年写的寓言小品《娱神小景》中，如何应对神仙化的政治权威再次成为一个主题。在《娱神小景》中，人民不是用放火烧山，而是用讨好、取悦的方式来对待神。他们在锵钹齐鸣和香烛缭绕中，恭恭敬敬地送走那个他们已经不再爱戴，但却不能不继续惧怕的神。神是可怕的，轻慢不得的，更不用说得罪了。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送走了神，人总还是有自由的希望。

《火烧的山》大概发表在1941年，与《娱神小景》相隔40年，时过境迁，人事全非，青春不再。但是，我父亲在他复归素人的时候，仍然以苍老的心境和世故的智慧保持着对年轻时代自由心灵的记忆。谁都年轻过，谁都有过青春的自由激情，然而未必人人都曾在属于自己的文字中留下这种自由的踪影。青春少年之交是最珍贵、最靠得住的挚友，李军和我父亲之间有着一辈子的友情。“文革”期间，连亲人相互出卖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然而，李军就在自己都难以自保的厄境中，就在我父亲本人都不再把旧日文章当一回事的时候，他却居然冒着被株连的危险保存了我父亲几十年前的文稿。他保存的这些断简残篇不仅留住了我父亲早年心灵自由的印痕，且重新燃起他写作的热情。而就在李军送还给我父亲文稿后才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去世了。

我父亲抗战期间发表的诗歌、散文、翻译用的是“秦淮碧”、“乐山”这些笔名，尤其常用的是我母亲的名字“王璠”。这可能是我父亲在1949年以后放弃写作后，完全被人们遗忘的一个原因。1985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格律诗选》共选诗从郭沫若到顾城的233首，其中有一首王璠的《俚歌》，大概不会有人知道诗作者的真正名字。

笔名隐蔽真名，这后来对我父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除了他

的一些老朋友,没有人知道他以前到底发表过一些什么作品。在“文革”的审查中,追查者似乎忽略了命令他留下一份文学作品的清单,以用作他的罪证。但是,也正是因为没有人命令他留下这样一份清单,在他的老友都已故去的今天,我再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他在年轻时候到底写过些什么作品。

从李军保存的那些文稿看,我父亲早年的文字只能说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也是抗战时期许多青年和校园文艺的共同特点。经历了“文革”,我父亲对自己年轻时代的作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他晚年写的阮籍故事《穷途》中,年老的阮武这样回忆他多年前的少年族弟阮籍:“他曾经向我吐诉过多少济世的怀抱!他对前贤的倾慕、对盛世的向往又是多么热烈而真诚!……所有他那些恳挚的梦想,现在都只能在我手边这一卷断简残编里听到一点儿依稀似梦的回声了。”我父亲说的其实就是他少年时代的自己。尽管那些早年的作品不过是“依稀似梦的回声”,但它们却已经具备了他后来作品的基本特征。他从小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读了八年私塾后接触并喜爱上新文学,后来又以英语为专业,中国诗词和西方美体散文成为他文字的两条活水渠道,形成了他一生的文字特征。他的新诗受西方诗歌、散文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他的旧体诗词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中西古今的背景使我父亲的写作有了一种综合的特征,不仅是文字的,而且是思想内涵的。他的综合可以说是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结合:其中现实既是时代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包括人的内心世界;象征表现于隐微含蓄;玄学则是追求思想的感性显现。他的诗能够将意象与思想凝合,传统的主观抒情于是让位于沉思的冷峻处理,渗透着现代人的困惑、怀疑、破碎和反抗。《火烧的山》就是一个例子。它的象征很含蓄,没有直接的个人抒情,而是把一些具体的意象(山、火、仙人、执火人)与一些普遍的主题(权威、反叛、冲突)结合在一起。诗人不是某个事业或主义的代言人,而是一个个体的自我。诗人对浪漫的理想扩张或感伤的文人

自恋亦没有兴趣,更无意成为某党某派的先知或使徒。

我父亲擅长散文写作,不是那种所谓的“抒情散文”,而是个人和个性化思考的散文,称作 personal essay (小品)。Essay 是我父亲情有独钟的文学形式,我从小到大,一直到进英语系当研究生,他只指导我读 essay 这一种类型的文学,还有一些诗歌和古希腊戏剧(那本身就是诗),几乎从来不叫我读小说。Essay 的原意就是“慢慢地形成和道出你的想法”(try out ideas)。这是一种从容不迫、深思熟虑的反复观照方式。散文体写作使得我父亲能在观照生活的时候,始终采用怀疑和沉思的眼光,也使他的情思方式能够摆脱陈旧的形象意境,而非滥情的文字来表达深潜的、富有诗意的思想。

他的行文从容、儒雅,有一种悠缓的美,用来叙事说理,叫人读起来有一种你急他不急的感觉,这样的行文对今天的读者也许有些老式,但却可以调动他们的感觉和思考,去体悟一种深厚的汉语之美。眼下中国社会中的不少语言,包括文艺、媒体和学术语言,要么是夸大、虚伪、空洞,要么就是煽情、幼稚和假天真。相比之下,“老式”语言简练、隽永、凝重、深沉。它的古朴散发出历史沉淀的智慧和源远流长的理趣,给人带来一种思考和表达上的满足,也使人觉得能够与矫情虚饰、千人一面的“场面上”语言拉开距离。

3. 抗战时期的校园诗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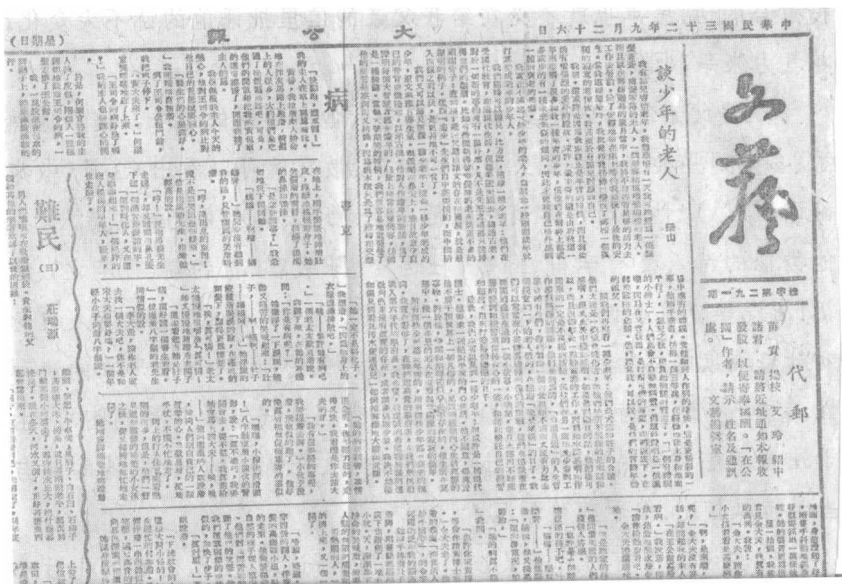
我父亲的新诗、散文大多写作和发表于抗战时期。虽然他的历史问题中有一条是与胡风分子曾卓有书信来往,但平心而论,他的诗歌取向与曾卓很不相同。抗战时,有一批诗人聚集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七月诗丛》周围,如绿原、阿垅、曾卓、鲁藜、孙钿、冀沅、彭燕郊、杜谷、牛汉、鲁煤、罗洛、方然、芦甸等。他们大多受到艾青的影响,肯定诗的战斗作用、大众性、“突入现实”、“为人民的今天和明天歌唱”,等等。这些都不是我父亲的兴趣所在。如果我父亲与这些诗人情

投意合的话,曾卓也就不必在给我父亲的信里批评他的诗不大众化,花气力来争取他了。

从我父亲的诗作和其他作品来看,他有不同的追求,这从他熟悉、喜爱哪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诗歌、散文就可以看出来(见《散文翻译话旧》)。他平时常常谈起的是冯至、穆旦、袁可嘉这样的诗人。其他类似的诗人还有辛笛、郑敏、杜运燮、陈敬容、杭约赫(曹辛之)、唐祈、唐湜等。这些诗人对战争动乱有深切的个人感受,重视诗人自身对社会现象的体验,注重诗艺的磋磨与意象的新颖,追求形象的流动性。和不少这类诗人一样,我父亲熟悉外国现代诗歌并受到陶冶,由于注意熔炼哲理诗的思辨、社会诗的技巧、抒情诗的魅力,他的诗与当时诗风相比,偏于蕴藉深沉。

这些诗人中有的后来又被归入“中国新诗派”。从时间的先后来看,我父亲未必与“中国新诗派”有什么关系。他从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就已经发表过不少诗作,而“中国新诗派”的成形则是抗战以后的事了。我父亲1938年开始在章靳以先生主编的重庆《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发表诗作,那时他是南开中学的学生,靳以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以为他是南开中学的教师。赵燕声在《当代作家小传》中,说靳以“曾在战时重庆的《国民新闻》编过副刊”。葛琴选注,上海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散文选》中,说靳以“抗战后……兼任《新民报》副刊‘文群’主编”。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有所出入。我父亲的自述可以用来佐证。

40年代初,我父亲的散文、诗歌、译作有一些发表在桂林版的《大公报》副刊“文艺”上。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港版《大公报》停刊后,日本人提出条件让该报复刊,但遭到拒绝。在此前,胡政之于1941年初创刊《大公报》桂林版,以作港版停刊后的退路。桂林时期的《大公报》言论方针力主自由民主,政治上与渝版保持距离,一般不转载渝版社论,保持独立思考,社论除徐铸成自己写外,



《谈少年的老人》，《大公报》“文艺”第291期，1943年

还请社外著名文化人如千家驹、张锡昌等人执笔。渝版女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桂版照发。徐铸成的社论与彭子冈的通讯，成为桂版的两大特色。有人称誉“他的社论真是赛过几师雄兵，他的副刊成为真正人民的园地。”当时桂版日销达6万余份，等于桂林各报发行之总和。副刊“文艺”的影响也很大。无奈1944年日军侵入湘桂，9月，桂林陷落，《大公报》桂林版的职工分路撤往重庆。可惜，我父亲发表在副刊“文艺”上的文章，我手上一共只有三篇，都是李军保存下来的。

抗战期间，我父亲还在《诗月报》、《珞珈周报》、《中国诗艺》等报刊上发表他的作品。这些抗战时期的刊物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是中文系研究生论文的好题材，不必大家都老是围着几个名家和名刊物打转，炒冷饭。这些抗战时期的刊物都是中国